

世

瑪志尼

著尼洛西·I利大意

譯

虹

行發社版出進改

瑪志尼傳略

約瑟·瑪志尼 (Joseph Mazzini) 於一八〇五年六月廿二日生於熱那亞。幼時體格纖弱，發育遲滯，但在智力上却是早熟的。及長入「熱那亞大學」，原想操父舊業，研習醫學；不久却改變了方針，轉入法科肄業。可是其天性傾向於文學。後又日益感到意大利當時正在忍受的種種苦難，他的作品就帶上了一種前進的自由主義色彩。旋即加入「燒炭黨」(The Carbonari)。但於一八三〇年被出賣，被禁於薩伏那 (Savona) 牢獄中，達六個月之久。其組織「青年意大利黨」的計劃，即在此形成；至一八三二年，瑪志尼在其僑居地馬賽發佈「宣言」，號召將意大利自外國的與本國的壓制下解放出來。後

被逼離馬賽，遁入瑞士，他的生活就較少爲人知道。他於一八三四年創立「青年歐羅巴」協會。一八三七年赴倫敦，發表了許多極有文學價值的論文。一八四八年返意，在加里波的（Garibaldi）麾下作戰，惟歷時不久。他被牽涉於多次叛亂中，屢被判處死刑。他雖喜其意大利統一之夢終得實現，但以其君主政體爲可憾。其後半生大部分消磨於倫敦及羅加諾。一八七二年三月十日，卒於比薩。

瑪志尼的思想

自一八三

年

瑪志尼

的思想

一

瑪志尼

的思想

美國社會改革家錢恩·亞丹姆士 (Jane Addams, 1860-1935) 在其名著「赫爾院之四十年」(Forty Years at Hull-House) 中說道：「時在一八七二年，我年紀還不滿十二歲，有一天早上，我走到父親的房裏去，看到他坐在火爐旁邊，手裏拿着一張報紙，神情非常嚴肅；我急切地詢問原因，他才告訴我，約瑟·瑪志尼 (Joseph Mazzini) 已經死了。在這以前，我連瑪志尼的名字都沒有聽到過；經我父親把他的生平告訴了我。」

些以後，我又滔滔不絕地辯論起來，力說我父親並不認識他，他並不是美國人，我不明白爲什麼我們應該爲他而難過。現在我已記不得我那些沒價值的議論怎樣被完全駁倒，總之在最後我得到了一種我始終認爲極寶貴的教訓，感到了存在於抱着同樣理想和希望的人們之間的純正情誼，縱然他們的國籍、言語、和信條是各不相同的——這種種東西，對於正在力求廢除美國的奴隸制度或解除意大利的「哈布斯堡」皇室壓迫的人們，是沒有絲毫關係的。我覺悟了，我由衷地感到我那狹隘的愛國觀念很可恥；我興高采烈地從父親的房裏跑出來，知道非私人間的超越國界的情誼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並非說說而已。」

自一八三一年至一八四九年，瑪志尼乃是這些「實實在在的事實」在全歐洲的最懇摯的預言者和最虔誠的使徒。他的私生活跟其政治的、宗教的使命密切地相一致，他的名字變成了彼此距離極遠的各國人民的象徵和戰鬥口號。嘉萊爾(Carlyle)曾在英國跟他親自結識。這個「英雄與英雄崇拜」的著作者，在許多方面不贊同他的意見；可是據他自己告訴我們，當他着手爲其傑作尋覓一副容貌來代表近代政治制度和社會生活之下的「殉道者」時，除了瑪志尼的以外，他竟想不到什麼人的顏面。萬生堡(Malvida von Meyenburg)報告着尼采的一種依稀相似的判斷：「在生活很美的一切人中間，尼采

特別豔美瑪志尼的生活——它完全集中於一個思想上，這思想彷彿變成了一朵火燄，將其整個身心消耗於其中。詩人們摒除他們要從事行動的衝動，其法爲把這些衝動用想像中人物的血肉包裹起來。他們把行動和受難轉移於他們身外。在瑪志尼則恰恰相反。他在自己的生活把他自己表現出來，他的生活成爲繼續不斷地用行動來實現其高尚的人格。他是其自己的悲劇中的主角：他忍受種種艱苦以求實現其理想。」

瑪志尼担任了一種民族的和人道主義的「救世主」的職務。在一八四八年以後，他這職務真的變成了一種悲劇。在當時，意大利的統一和獨立已在逐漸實現，但並非照着他所宣傳的共和主義和社會革命的方向，而是處於略富爾（Cavour, 1810-61）的領導之下，「薩伏亞王室」（The House of Savoy）的庇護之下——是許多偶然的外交策略和妥協的結果，是唯利是圖的外國用武力促成的。在社會問題方面也是如此。瑪志尼會把「社會改革」包括在他所宣揚的綱領中，其烏托邦理想類似法國的初期社會主義者，尤其是聖西門一派。可是實際發展所取的路綫並不如此。在瑪志尼晚年時成立的「第一國際」中，由馬克斯和巴枯寧的理想佔着優勢。而瑪志尼並不是會隨成敗而改變主義的人——實際上他重視主義比什麼都更甚。因此，其信徒就逐漸散失了。曾在大衆眼前如此輝煌奪目的他的形象，逐漸變成模糊而退入了後方。曾經轟轟烈烈地喊出斥責和預言來

他的聲音，失去了它的力量和聽衆。當他晚年時，人們都把他認爲是一個屬於過去時代的人物。

後來的歐洲和意大利的思想轉變，伴着一種影響遠大的對「愚蠢的十九世紀」的反動，更其擴大了後一代的人跟瑪志尼所懷抱的思想和情緒之間的裂縫。在二十世紀中，仍有少數人自稱是「瑪志尼主義者」，可是他們不過複述着他的若干政治上格言吧了；絕沒有一人信奉其浪漫主義的信念。瑪志尼遺傳給其繼承者的最重要財產，恐怕是他那決不妥協的反對精神及其審慎嚴正的榜樣。但是這種態度和見解在政治上很難收效。接受它們的人爲數不多。其中的一個原因是，民主主義制度在歐洲勝利後，所需求的精神是跟祕密結社、陰謀革命的時代所流行的不同了。且就意大利而言，思想和理想上的爭鬥已失去了不少的熱烈性。無論社會主義者、共和主義者，或教士，都以組織工會、合作社、和互助團體來籠絡大衆，不然就用種種方法來求得純屬地方性的權益。而在這種種問題上，瑪志尼的教誨是沒有什麼話可說的。

二

可是，近來我們已逐漸明白過來，我們的遠離瑪志尼的時代及當時產生的政治問題

，不過一部分是事實；在許多方面只是一種表面的現象——如果不是虛幻的話。今日的資本主義世界機構上的危機，當然是由帝國主義的基本構造中發生出來的；但是情形所以如此錯綜複雜，却是由於十九世紀的許多問題懸而未決，現在又重新拾起頭來了。我們可以說，當代的特殊問題爲必須求得一種世界政治組織，以適應我們目前的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的高度發展。我們至今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致社會上的保守分子得以重提出前世紀的許多陳舊問題來——例如民族問題、政府的社會主義統制計劃——並且把他們爭取自己的利益的戰爭隱藏在這些問題後面。此種古怪的矛盾的矛盾情形，使瑪志尼的許多已經被人們忘却的作品重新取得了一種異常新鮮的意味，尤其是因爲在歐洲的許多國家，今日正如百年前一樣，自由的精神仍被逼得藏身於地下的祕密工作中。不用說，如拿這一種眼光來閱讀或重讀瑪志尼的作品而要避免失望，我們應該提防着，不要想從其中取得補救目前的缺陷的方法。可是，在那一重「浪漫主義時代」所特有的哲理、嗜好、夢想、和謬誤的硬殼之下，你也一定可以看到不止一個「人類熱望」之火花，這種熱望將與人類同其久遠地長存於世。

瑪志尼成長於拿破崙的帝國崩潰以後的歲月中：當時的時世在表面上是安靜的，可是在內底裏却充滿着新的爭鬥。反動派得意洋洋地君臨着全歐。各國的保守分子都在安然地從事於恢復原來的制度和他們原有的特權，任意使用着警察的恐怖和恫嚇手段。可是，自由思想依舊生存着——生存於拿破崙時代作戰的退伍軍人等等的中心；它繼續激勵着知識階級的優秀分子，造成了一個哲學和詩歌的全盛時代。警察的審查制度在整個歐洲都很嚴厲，可是它不足以阻止新的思想和新的藝術形式從這一國傳到那一國，而針對着那建立於刺刀上的「神聖同盟」，培植成一個建立於精神的自覺上的「人民同盟」——這種精神上的自覺決不是全然消極、全然沈思默想的。真正的精神總是要行動的：當時的精神產生了不少的行動者——義勇軍和陰謀革命者，他們準備在反動派選定作戰的戰場上跟它接戰，那是以暴力為武器的。

瑪志尼的「自由崇拜」有一部分得自家庭的感化。他的父親曾在「利高里亞共和國」(Ligurian Republic, 1797-1800, 其首都為熱那亞)的政府中做過部長，後來也始終沒有忘記那些日子。母親是一個虔誠的自由主義者；教授瑪志尼拉丁文的先生也是，他終身信奉荷蘭神學家楊生(Jansen, 1585-1638)的教義。可是，宗教上的職業或許有時成熟於適當的環境中，預言家的使命却往往好像自天降臨似的，在一剎那間來到。瑪志

尼曾自述其初次感到必須獻身於其使命的情境如下：那是一八二二年四月裏的一個禮拜日。當時他年方十六。他正跟他的母親和一位「世交」在熱那亞的一條街上散步。在幾天以前，鄰近的辟蒙特（Piedmont）——在意大利西北部——公國內發生了一場自由主義軍官的叛變。它立刻被平定了，那些不幸的叛變者囊無分文，後面還有警察緊緊地追逐着，都逃奔到熱那亞和附近的其他各港口，希冀能設法上船，逃到當時由自由主義的革命佔着上風的西班牙去。這些逋逃者混在那些禮拜日在外遊樂的人叢中，力求不致引起人們的注意。可是憑着他們那副外省人的特徵，他們那種異樣的服裝，尤其是他們臉上的那種兇猛緊張的表情，要把他們檢出來是很容易的。突然間，其中有一人向瑪志尼等走了過來。他是一個臉色黝黑、鬍鬚很濃的人，眼睛裏好像冒着火，神氣精悍而風風凜凜。他給了年青的瑪志尼一個十分深刻的印象，以致四十年以後，瑪氏還能記得他的名字。他對那三個逋逃者拿出一幅拉得緊緊的手帕來，低聲說道：「爲意大利的犯法者求助！」收進了那些獻給他的錢幣，他就走向另外的人羣中去。

這就是瑪志尼轉變方針，獻身於爲其祖國爭取自由的工作的契機。自此以後，他即在睡夢中也看到這些逋逃犯，這些被人出賣、在自己本國被人打敗，可是絕不屈伏、絕不畏氣的人——他們只想跑到另一個地方去繼續爭取自由。瑪志尼正在肄業的大學裏的

師生，看到他似乎突然變爲老成了：他不聲不響，垂頭喪氣，老時好像心不在焉。他穿上了黑色的衣服，繫着黑色的領結，彷彿居喪帶孝似的。在他的本心中，他的確已決意把其國難當作自己喪失親人一般。

正在這個時期，他偶然讀到了意大利小說家烏哥·福斯科羅（Ugo Foscolo, 1778—1827）的名著「雅各·奧蒂斯的最後數信」（The Last Letters of Giacopo Ortis）——這部作品的憂鬱情調雖跟哥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相似，但也含着一顆不得志的愛國心。瑪志尼把這部小說讀了一遍，又讀一遍，最後他竟發誓要把全文讀得會背。他異樣起勁地背誦着長篇大段，竟使他母親担心，以爲他要想自殺了。其實他不過染上了當時流行的「厭世病」吧了。不久他就恢復了原狀。可是他却把這部作品算作形成他的性格的主要勢力之一。瑪志尼原是一個體質纖弱的少年，帶着極緊張的神經質的氣分。這些生理上的特徵，大概特別適於「浪漫主義」的滋長。不過在實際上，當時的年青人幾乎全是浪漫派——無論在服裝方面、嗜好方面、道德方面、或行爲方面。海闊天空的說話，觸動崇高的致命的熱情的言辭，海枯石爛的信誓，月明之夜在墓中潛思默想，生在蒼白的臉孔上的眼睛凝視着永恆的真相——這一切都是當時的風氣。在瑪志尼的傳記中，直到他的晚年，都可以看到浪漫派的態度和衝動；不過我們不該過分重視這些，因爲它

們不過是一重外壳，在其底下有一種更深刻的文學上的、倫理上的、和宗教上的浪漫精神，那才是瑪志尼的大光榮、大戰鬥——那形成他的一生的使命。

四

瑪志尼寫作他的第一篇文章，是在二十一歲的時候。那篇文章論到但丁——這位詩人，瑪志尼是尊之爲「意大利的國父」的。「一八二七年時」，後來他曾這樣寫道，「古典派與浪漫派的戰鬥達到了最高潮：前者擁護文學上的專制主義，追溯至二千年左右以前；後者力圖脫離這種專制主義，而以自己的感興爲本。我們年青人都是浪漫主義者。」當時最受青年們歡迎的作品，是曼左尼（Manzoni）的「未婚夫妻」（The Betrothed）——這部小說至今仍爲意大利浪漫主義的最可愛持久的表現。可是不久，意大利的浪漫運動就帶上了一種顯著的政治色彩和社會色彩，很難跟意大利的統一和獨立運動相區別了。就全體而言，意大利的浪漫主義文學本來只屬第二等品質，但無論如何却是一種愛國的文學。瑪志尼的情形實可作爲這一時期的多數意大利知識分子的代表。他的決定拋棄文學而作政治上的鼓動，乃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故意行動——後來他曾稱此舉爲他生平的最大犧牲。他在文學批評或且文學創作方面具有真正的才能：這很容易拿他少年時

發表在「熱那亞導報」以及該報被封閉後發表在「里窩那導報」上的文章來加以證明。後來他僑居英倫時，靠賣文來維持生活，一點也不覺困難。他投稿於英國的各重要雜誌。不過，他年青時曾加以思索的種種計劃——戲劇脚本、歷史小說、其他的文學上主意——却一無所成；他對於這種失敗，用這一理論來加以辯解：在受外國人統治的國度裏，雖然或可出產預言家，却決不能出產藝術家。他曾說：「藝術並不是這一個人或那一個人任性的產物。它要求是千頁嚴肅的歷史，不然就是一種預言。」他接下去又說，如果藝術偶然完成了這雙重的使命，例如他以爲在但丁的全部作品中和拜輪的一部分作品中，那就是無上的藝術了。

至就意大利而言，藝術却不是預言，就什麼都不是了。意大利人沒有自發的自由的生活，已有三百年之久。他們只是一些昏迷不醒的奴隸，由外國人餵養着。若要藝術復甦，只有呪咀這三百年而彈起「未來」的曲調來。要做到這件事，必須去探索一般人民的潛在的、不自覺的、昏睡着的生活，按着全民族的凍住的心臟，把握着它那些偶然的幾乎不能覺察的悸動，然後回頭提出高尚的理想和健全的主義來，以引導那些比較靈敏的人。個人的感興，應發源於民族的集體生活，正如千紅萬紫的花朵——大地的詩歌——發源於各國的國土一般。但在當時的意大利，很難說到什麼集體生活。那裏並沒有什

麼思想中心和情感中心，並沒有統一性或經常的有秩序的表現。也許偶然會有孤另另的像火山似的迸發出來的藝術，但決不會繼續不斷或一步步前進——在這兒，瑪志尼提起「新大陸」上的那些茂盛的叢林，其中枝柯交叉，造成了熱帶森林的偉大的統一性。一個沒有國家、沒有自由的民族，或許會產生藝術上的先驅者、藝術上的預言家，但很難產生藝術家。所以，知識分子不如先集中心思於這一問題上：「我們要不要有一個國家？——如果他們竟能創造一個國家，那末藝術之花就會在他們身後怒放，來裝點他們的坟墓了。」

今日的人，或許會把這種理論認為天真或竟虛妄；但唯其含糊不清，它居然能把一種極重大的使命賦予了人們。它隱隱地指示着，現在意大利人應該擯棄其點綴或娛樂宮庭中人的文學、奉承那些怠惰的無信義的愚蠢的統治者羣的文學，而去尋求一種積極的、戰鬥的、跟一般人民相接近的文學，來實行其社會的、教育的職務了。可是，在瑪志尼的時代，所謂意大利人不過是一大批被窮困和迷信化成野獸一般的文盲。要使十足的奴隸成為自由的公民，僅恃有作用的劇本和有主題的小說是不够的。即使在比瑪志尼的更開明得多的環境中，任何受過教育的具有愛美心和愛真理的心並想為其同胞効力的人，都必須在崇拜文學與積極生活兩者之間加以抉擇。一味寫作有什麼意義呢？為誰寫作呢？

？我們該做書呢，還是製造炸彈？有許多人爲自由而死，另有許多人寫書來記述這些爲自由而死的人。當然，有時候我們可以看到，一本書所收的效果跟一場決戰同樣重要。

五

薩耳維米尼 (Salvemini) 曾說：「瑪志尼自其周圍所流行的哲學、政治學說、和歷史中，取得似乎可以跟他的氣質相配合的種種元素，而把它們組成一個相當連貫的體系，以應付其終身事業上的實際需要。」瑪志尼的母親是楊生的信徒 (Jansenist)，而且如上所說，她的周圍還有其他的楊生主義者，（例如瑪志尼的拉丁文教員），因而造成了一個嚴肅、樸素、虔信宗教的環境。瑪志尼既是一個敏感的兒童，自然而然感應着這些壓力而長大起來，懷抱着以基督教的虔誠爲背景的極合倫理的人生觀。後來，他曾以許多哲學上或神話上關於「天命」或「人道」的概念來充滿其精神上世界——這些概念係得自德·曼斯志 (Joseph de Maistre) 等作家及「宗教復興」時代的其他理想家。在這所謂宗教復興的時代，差不多所有的作家——無論是自由主義的或反動的——都感到了它的影響。

這種復興的根源不難找到。它乃在由「法國大革命」而生的種種思想和制度所遭遇

的政治上災殃中。革命失敗後，一般人照例要喪氣而自覺卑微。人們失去了自信心。他們重新感到了自己的薄弱無力和沒有價值。而這種種情形都有利於教士：他發見其羊羣惶惑地懺悔着回到柵欄中來了。拿破崙的失敗似可證明人類的歷史自有其法則，這些法則即使很有本領的人也無法加以變更。如果有時候，歷史的法則似乎暫時失去了效力，那正是「神的耐性」用以訓戒人們的一種方法，它要藉此使人們明白：如果讓他們無法無天地管束他們自己，他們的情形將更壞多少，他們會遭遇怎樣的災殃。在跟蹤着戰爭和革命而來的宗教復興中，常有兩種元素存在：其一為渴想回家的「浪子」的思鄉之情，其另一則為統治者羣的權謀本能，他們自己雖然毫無信義，並不信神，但却知道如果用對於上帝的敬畏心來使一般平民安分守己，那就是最好的警察。

瑪志尼雖然相信「神明」能起作用，但其觀念跟反動派的截然不同。批評瑪志尼最銳利的商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曾指出瑪志尼寫給西思蒙第(Sismondi, 1773—1842——瑞士歷史家兼經濟學者)的一封信來，以證明瑪志尼主義者在其宣傳中所提起的上帝乃是一種政治上的「實體」。這或許言之過甚。沒有什麼私信，足以使人懷疑瑪志尼的一生行徑所可證明的宗教信念的誠摯性。瑪志尼在做政治家以前，原是一個倫理學家；即在以後，他的倫理學家氣味還是濃於其政治家氣味。當瑪志尼成為歐洲諸民

族的獨立運動的總經理和總監督以前，其上帝乃是他的良知的一種獨斷的假定——他這上帝是無限的倫理、無限的愛、無限的正義、歷史的嚮導、引導人們走向完善之境的導師。有時候，瑪志尼所祈求的上帝很像是泛神主義者的神道：他可與自然律或人間的法律相對調，可在宇宙的和諧中加以崇拜。還有些時候，瑪志尼覺得泛神主義必先假定宇宙的一致性，因之「自我」與「客體」是二而一的，「造物主」和「造物」也是二而一的，因而就沒有自由了。每當他想到這一層的時候，他的倫理意識就要起而反抗，他就會轉向一位有人格的、超然存在的上帝——爲一切人之父的上帝、爲一切人之審判者的上帝。瑪志尼本來不是一個哲學家，所以這些前後不一貫，如此擺動於泛神主義和一種主義之間，從來沒有使他在心理上怎樣不安，更沒有使其熱烈的宗教信仰稍受挫折或冷卻。正如他那最忠誠的闡述者克萊斯比（Cressy）所說，瑪志尼由這兩種不同的哲學吸取其緊張的精神生活的滋養料，用那有人格的上帝來支持砥礪其責任心，而用那萬有神來鞏固其時常要喪氣的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心。在瑪志尼的心目中，除宗教以外，不能產生人類的同胞感。不但「倫理需要一個天堂和一種教條來維繫它」；如果沒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熱望，就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能够存在。真理不能憑智力來發現。它必然存在於人心中，那是上帝把它放在那兒的。我們怎麼知道上帝存在着呢？瑪志尼答道：「上